doi. 10. 3724/1005-0566. 20260406

范式转型与路径建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策略

刘彦平[1]，常含笑[2]，赵　峥[3]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6；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北京　102488；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010）

摘　要：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高质量建设，对实现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国外高校社会科学实验室在知识生产方式转型、技术环境迭代、社会需求升级等多重力量作用下，经历了萌芽探索、逐步定型、伦理规范化与跨学科发展、深度交叉融合发展 4 个阶段，在战略定位、组织架构、资源机制、人才培育及开放合作方面形成可借鉴的经验。我国高校社科实验室的整体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面临定位同质化、治理机制滞后等挑战。加快我国高校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应明确差异化发展定位，优化实验室功能结构；推进制度创新，构建适应交叉研究的治理机制；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提升科研韧性与学术自主性；发挥实验室育人功能，培育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拓展国际合作网络，提升学术话语主导权。

关键词：高校；社会科学实验室；国际比较；中国策略；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6)03－0060－13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and path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Chinese strateg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laboratories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LIU Yanping[1], CHANG Hanxiao[2], ZHAO Zheng[3]

(1.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ASS, Beijing* 100006,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3.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laboratories in universities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aradig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orces such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the iteration of techn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upgrading of social needs, the social science laboratories in foreign universities have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embryonic exploration, gradual shaping, ethical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deep cross-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ey have formed referential experience in strategic position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resource

作者简介：刘彦平(1969—)，男，内蒙古鄂尔多斯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治理与创新发展。通信作者：常含笑。

mechanism, talent cultivation and open cooperation.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cience laboratories in universities in China has made positive progress, but it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homogenization of positioning and lagging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cience laborator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we should clarify th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optimize the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laboratories. Promot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build a governance mechanism that adapts to cross-research; improve the multi-input mechanism, enhance scientific research resilience and academic autonomy;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laboratory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interdisciplinary compound talents; expan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enhance the dominance of academic discourse.

Key words: universities; social science laboratorie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hinese strategy; knowledge system

当前,全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正经历深刻变革。计算社会科学、人工智能辅助研究等新兴范式持续涌现,推动研究模式由个体化、文本化的理论推演,加速向数据驱动、算法赋能的集成研究跃迁[1]。新型社会科学范式逐步形成,在发现范式、组织范式、知识生产范式等层面转型明显。发现范式层面,从理论预设驱动的假设检验范式,向数据与算法驱动、人机协同的探索性发现范式转型。组织范式层面,从依托单一学科院系的封闭式科研单元,向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的数智化平台化科研组织转型。知识生产范式层面,从特定学科范式内的封闭运行,转向跨领域、多主体协同的开放共创生态。同时,数字治理、平台经济等复杂现实议题,不断要求社会科学提升对多元问题的综合研制与前瞻分析能力[2]。在此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以下简称"社科实验室")作为推动前沿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深度交叉、系统集成与双向赋能的关键枢纽平台[3],以集成化的数据与计算设施支撑研究方法的智能化跃迁,以跨学科的项目制架构为开放协作提供制度空间,以问题导向的协同研究推动知识生产向开放共创模式转型,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成为推动社会科学范式转型的重要载体。《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明确提出"建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将其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工程之一[4]。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欧美及部分亚洲顶尖高校较早将实验室化的组织模式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在运行机制与治理模式上渐趋成熟,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化与平台化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相较而言,我国高校社科实验室建设近年来虽已取得部分实质性进展,但整体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功能定位、资源整合与跨学科协同等方面和世界一流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5],急需系统梳理国外高校社科实验室的建设模式与运行逻辑,并结合我国实际形成发展与改革路径,推动我国高校社科实验室高质量发展。

一、建设高水平高校社科实验室的战略意义

当今时代,科技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地带。面对科研范式的深刻变革、全球学术竞争的格局重构以及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需求,高校社科实验室已从辅助性科研平台跃升为驱动知识生产转型、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服务国家战略的关键载体。

(一)科研范式智能化跃迁的关键支撑

社科实验室兴起根植于社会科学寻求实证化与科学化的内在逻辑[6-7]。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实验设计往往难以完全脱离具体社会情境而独立存在[8],需要不断改进研究方法,形成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补充的方法体系,共同服务于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与检验[9]。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与计算仿真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塑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与知识生产逻辑,推动其从经验驱动向智能驱动、从分散研究向结构化协作、从静态描述向动态预测转型[10]。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至 2028 年全球数据总量将增至 393.8 ZB,较 2018 年增长 9.8 倍[11],其中蕴含大量与人类行为、社会互动及公共治理密切相关的非结构化信息,涵盖社交媒体文本、行为轨迹记录与城市运行动态数据等。这些海量数据既

为揭示社会运行规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维动态观测条件,也对传统依赖小样本问卷、深度访谈与静态文献分析的研究范式构成了根本性挑战[12]。算法模型的日益复杂与算力需求的持续攀升,使得个体学者或零散团队难以独立完成从数据采集到结果验证的完整研究闭环,科研活动愈发依赖集中化基础设施与专业化协作体系。社科实验室通过构建共享数据仓储平台、统一计算环境与标准化算法工具库,有效降低技术门槛,推动研究范式向“人机协同”的智能化模式跃迁,为突破传统方法的规模瓶颈与效率局限提供了核心支撑。

(二)应对全球学术竞争体系性博弈的战略选择

目前,高校间的国际学术竞争已从传统意义上的学者个体能力比拼与单项成果较量,升级为围绕新型科研组织形态与知识生产主导权的体系性博弈[13]。世界一流大学纷纷通过系统布局社会科学实验室,巩固其在全球知识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例如,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凭借全球领先的开放数据平台,推动大规模数据驱动研究,并培育了大批兼具社会科学与数据科学素养的复合型学者,成为计算社会科学的重要知识策源地[14]。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依托高度跨学科、项目驱动的运作模式,不仅孵化出可穿戴设备、城市数据可视化系统等开创性技术成果,更主导了多个科技与社会融合前沿议题的研究议程,在引领技术演进与社会变革方向上占据了重要话语高地[15]。面对这一格局,若我国高校未能及时在社科实验室这一新型组织形态上实现战略性突破,不仅将错失全球社会科学前沿探索的先机,更可能在学术话语权竞争中长期处于被动。因此,加快高水平社科实验室建设,既是提升我国高校学术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也是主动融入全球知识生产体系、参与议题设置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必然选择。

(三)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

我国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整体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部署,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16]。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 +”行动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向人机协同模式转变,探索建立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形式”[17]。高水平社科实验室的建设,正在从知识生产范式、方法论创新与学术共同体培育等层面,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首先,社科实验室依托多源数据汇聚与智能化分析平台,推动知识生产从个体思辨向大规模实证研究转型,使扎根中国经验、回应中国问题的学术产出成为可能。其次,社科实验室以问题为导向打破学科壁垒,促进社会科学与计算科学的深度融合,在方法论层面催生出适配中国情境的研究工具与分析框架,助力自主知识体系摆脱对西方学术范式的路径依赖。最后,作为建制化的科研平台,社科实验室能够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设置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吸引并培养兼具本土问题意识与前沿方法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形成持续产出原创性概念的学术共同体。通过上述机制,社科实验室不仅为构建具有中国立场、国际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更以制度化的方式确保了这一建构过程的可持续性

二、国外高校社科实验室的发展历程

国外高校社科实验室的孕育与演变,是在知识生产方式转型、技术环境迭代与社会需求升级等多重力量交织作用下渐次推进的历史进程,其演进轨迹大体可划分为 4 个历史阶段,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如表 1 所示。

(一)萌芽探索阶段(19 世纪末—“二战”前)

社会科学实验室的产生,内生于社会科学追求科学化和实证化的学术动因。1879 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立全球首个实验心理学研究室,被视为社科实验室的开端,该实验室的建立促使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18],也为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方法论转型提供参照。随后,量化测量、实验控制等理念逐渐在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应用[19]。以杜波依斯在亚特兰大大学建立的社会学实验室为代表,在早期已构建起兼具多元方法论与问题

意识的现代社会学研究范式[20]，综合运用多元实证方法开展族裔社区系统研究[21]。这一阶段实验室规模有限、议题聚焦，主要功能在于建立经验研究范式，培养具备实验技能的学术人才。

表 1　国外高校社科实验室的发展阶段及主要特点

发展阶段	时间跨度	驱动因素	主要特点与范式演进
萌芽探索阶段	19 世纪末—“二战”前	社会科学追求科学化与实证化的内在学术动因；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论示范	实证化范式：引入量化测量与实验控制，实现从哲学思辨到经验实证的跃迁。研究聚焦微观行为验证，规模有限，旨在培养实验技能人才
逐步定型阶段	“二战”后—20 世纪 60 年代末	战后重建与国家战略需求（行为规律与决策机制分析）；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国家科研资助体系（如 NSF、DARPA）的强力驱动	组织化科研范式：从个体行为验证转向大规模社会系统观测。实验室形态趋于科层化与规模化，议题契合战略决策需求，伦理规制尚未系统建立
伦理规范化与跨学科发展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20 世纪 90 年代	高风险实验引发的伦理反思；《贝尔蒙报告》等伦理准则的确立；单一学科视角的解释局限；计算技术的早期渗透	伦理与跨学科范式：伦理审查制度化，开启从学科内深化向跨学科整合的转型。实验室演变为连接学术、政策与社会的“边界对象”
深度交叉融合发展阶段	21 世纪至今	数字技术的爆炸式发展；数据驱动研究范式的兴起；对大规模社会互动与集体行为研究的需求	数据驱动与开放平台范式：向数据驱动、计算社会科学转型，研究尺度跨越个体与整体。研究过程动态迭代，知识组织网络关联，形成全球协同的开放创新生态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逐步定型阶段（“二战”后—20 世纪 60 年代末）

“二战”后西方世界步入重建时期，政府对行为规律与决策机制科学分析的需求显著扩大。行为主义革命对客观量化方法的强调，为社科实验方法的广泛应用奠定理论基础[22]。社会心理学与实验经济学迅速兴起，米尔格拉姆的服从性实验揭示了社会情境对行为的结构性制约，弗农·史密斯等学者开辟了实验经济学方法论[23]。在国家战略需求驱动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官方机构通过定向资助，推动了罗珀民意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等大型研究机构的建立，构建系统化数据采集与分析网络[24]；德、法等国亦依托国家科研体系布局社科实验室，并与政策部门深度协作，共同构建国家级实验数据网络[25]。这一阶段社科实验室形态趋于科层化与规模化，研究议题高度契合冷战背景下的战略决策与社会控制需求，但伦理规制尚处于缺位状态。

（三）伦理规范化与跨学科发展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20 世纪 90 年代）

前期部分高风险社科实验引发的伦理挑战促使学界对实验边界展开反思并启动制度重构。1979 年《贝尔蒙报告》正式确立“知情同意、利益权衡、公正原则”等基本伦理原则，机构审查委员会（IRB）对实验方案的伦理审查由此成为社科研究的必经程序[26]，伦理合规成为高校社科实验室运作的前置条件。与此同时，单一学科视角的解释局限日益凸显，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斯坦福大学人文实验室等新型跨学科实验室突破传统学科壁垒，借助虚拟现实与早期计算技术探索人文社科与工程技术融合的新范式[27-28]。这一时期高校社科实验室的功能定位从方法验证场所演变为连接学术、政策与社会公众的“边界对象”，通过问题导向的协同攻关实现知识生产模式的开放性转型。

（四）深度交叉融合发展阶段（21 世纪至今）

进入 21 世纪，互联网、移动通信与社交媒体催生了规模空前的数字数据流，为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资源空间[29]。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推动研究范式向数据驱动转型。以计算社会科学为代表的新兴领域借助实验室的数据处理与建模能力，通过挖掘多源数据在准实验框架下研究大规模社会互动与集体行为规律，实现研究尺度的整体性跨越[30]。典型案例如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构建的 Dataverse 已成为全球最大开放科研数据共享平台之一，提供可复验的算法服务与数据共享机制[31]。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类动力学实验室利用传感器与移动数据研究组织行为与城市网络结构，开创了“现实挖掘”的研究范式。当前，

高校社科实验室正经历深刻的生态化重塑，空间上社科实验室突破实体边界形成全球协同网络；数据上推进多源异构数据信息深度融合；治理上构建了政府、企业与学术界多元共治的开放创新生态系统。

三、国外高校社科实验室建设的主要经验

本文重点选取分布于北美、南美、欧洲、亚洲及大洋洲的 9 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社科实验室作为研究案例（见表 2）。所选案例或承担全校基础科研设施职能，或引领颠覆性技术创新，或深耕特定学科方法论，建设路径成熟，功能定位清晰。以下将从战略定位、组织架构、资源机制、人才培育及开放合作五个维度，总结其可以借鉴的有益做法。

表 2　国外典型高校社科实验室概况

实验室名称	核心定位	特色理念	代表性成果
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IQSS，Harvard University）	校级公共科研基础设施，赋能全校社科研究，构建学术共同体	强调协作，打造普适可及的统计与分析工具	开源数据平台（Dataverse）；开源工具集（Zelig）；开放差分隐私框架（OpenDP）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	颠覆性创新平台，探索未来社会技术原型	反学科；项目化	孵化 150 + 家初创公司；可穿戴计算、普适计算、人工智能艺术等领域的开创性研究
北海道大学实验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ERSS，Hokkaido University）	实验社会科学研究与推广中心，普及实验方法，推动社科研究范式转型	构建跨学科对话机制；引进、消化与再创新	构建日本首个跨学科社会科学实验合作平台；建立国际网络实验室，实现跨国同步实验
伦敦大学学院知识实验室（UCL Knowledge Lab）	聚焦教育科技与学习科学研究，探索数字时代的学习新范式	以人为本的技术设计；连接技术、身体与意义	开发任务制造者（Mission Maker）、学习设计器（Learning Designer）等数字工具
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RLAHA，University of Oxford）	科技考古与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确立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标准	技术—方法—平台一体化	开创并完善放射性碳测年法；开发放射性碳定年软件（OxCal）
波恩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BonnEconLab，University of Bonn）	理论检验与发展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心	精巧实验设计	在行为经济学、博弈论、市场设计等领域奠定学科基础
新加坡管理大学成功老龄化研究中心（ROSA，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国家级老龄化政策决策支持枢纽与动态数据中心	循证决策；利用数据改善新加坡全体民众的福祉	创立新加坡生活调查（The Singapore Life Panel），通过高频次数据收集动态反映新加坡老年人口福祉变化
悉尼科技大学社会正义与包容中心（CSJI，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大学社会责任转型平台，致力于社会公平评价与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	跨机构互动合作；社会影响治理	开发社会影响框架（SIF）
智利冲突与社会凝聚力研究中心（COES）	智利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力量，社会冲突与社会凝聚力跨学科研究平台	多学科视角研究；实证驱动	开展智利纵向社会研究（ELSOC）；建立冲突观察站（Conflicts Observatory）在内的多所观察站

（一）基于大学学科传统的差异化战略定位

清晰的战略定位是社科实验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逻辑起点。国外顶尖高校社科实验室普遍遵循“依托学科传统、服务大学使命”的定位原则，在差异化发展中形成独特功能边界。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校级公共科研基础设施”为核心定位，立足于哈佛大学在定量方法革新上的战略导向，通过构建全校共享的数据基础设施体系，包括数据共享平台（Dataverse）、统计分析工具（Zelig）及差分隐私框架（OpenDP）等，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提供数据资源与计算支撑[31-32]。这一定位使其成为“赋能者”和“服务者”，通过通用基础设施建设获得稳定的学校支持和广泛的学术认同。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则锚定学校“技术与人文融合创新”的使命，以“打破学科界限，创造变革性技术”为理念，推动艺术、科学、设计与工程深度交叉，成为跨界创新的标杆[33]。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发挥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方法论引领”的传统优势，其自主研发的 OxCal 软件因精度高与通用性强，被全球大部分考古研究机构采用，占据了该领域的方法制高点[34]。北海道大学实验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伦敦大学学院知识实验室、波恩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新加坡管理大学成功老龄化研究中心等，也分别结合本校的学科传统，在实验方法推广、学习技术融合、行为博弈论深耕等方向实现差异化的战略锚定。

（二）突破学科壁垒的组织架构与治理机制

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通过强化行政自主权与

项目制激励突破科层体制刚性约束[35],国外高水平社科实验室建设正是这一理念的典型实践。国外高水平社科实验室不同于传统高校院系以学科边界构建组织体系,通过构建“反壁垒”的组织模式,构建跨界参与的治理结构,在制度层面获得更大的弹性空间与创新动能。在运行逻辑层面,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采用“隶属学院但高度自主”的架构,既嵌入工程学院框架,又在人员聘任、项目设置、学生培养等方面享有充分自主权[15]。其内部以研究小组为基本单元,围绕前沿议题实行扁平化管理与项目制运作,形成“弱科层、强项目”的典型特征。在治理结构层面,北海道大学实验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采用“跨院系联合研究中心”模式,不仅整合校内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院系资源,更在运营与评价委员会中引入政府决策者、企业研发负责人、国际学者等外部专家,形成“学术共同体—政策共同体—产业共同体”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36]。在应用导向层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社会正义与包容中心将研究员、学生与校外社区机构、非营利组织紧密衔接,使研究议题与现实需求深度对接。

(三)多元化资金保障结构与学术自主性的平衡

经费来源的多元程度与配置方式的稳定程度,深刻影响着社科实验室的学术自主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过度依赖单一资金来源易使研究议程受资助方意图牵引,甚至诱发“项目导向型依附”。而构建“基础保障、竞争补充、社会合作”的多元经费保障体系,则是实现学术自由与组织稳定之间动态平衡的关键。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年度运营预算中很大一部分源于多家企业赞助商提供支持[37]。企业通过支付年费获得与实验室开展联合研究、优先接触新技术和提前获取成果的机会。同时,实验室还通过 E14 基金和年费 25 万美元的企业会员制,构建起“基础研究—原型孵化—创业加速”完整创新链条。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较高的学术探索自由度,也使实验室能够在保持商业合作活力的同时,维系跨学科项目集群的高密度运行,从而确立商业互动与学术自主之间的有效边界。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则呈现了另一种经费配置路径。该机构每年获得约 1200 万美元的大学核心预算用于支撑数据平台运行、技术支持团队及基础设施维护。同时,通过竞争性渠道获取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外部项目经费约 800 万美元,用于前沿研究。这种“稳定投入保障基础设施 + 竞争资金驱动前沿探索”的混合模式,既保障了长期公共服务的持续供给,又保持了研究方向的开放性与前沿性。波恩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则以德国科学基金会项目经费为主体,辅以大学配套预算,将有限资源集中于实验经济学与行为博弈论等优势领域,形成高度聚焦的资源配置策略,实现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率。

(四)实践导向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

高水平社科实验室已从单一物理空间转型为复合型学习与实践平台,兼具知识创造与人才孵化的双重属性。在培养模式层面,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推行的“项目制育人”模式具有突出的参照价值。学生通过真实科研项目和跨学科团队协作形成在实践中学习的认知路径,既要深刻理解社会议题与人文关切,又须熟练掌握编程、硬件开发与交互设计等技术能力,更要具备与企业、政府开展跨界对话的沟通协商能力。许多学生在完成学业前已深度参与创业孵化或政策试点项目。在产教融合层面,伦敦大学学院知识实验室通过 EDUCATE 项目,为 270 余家教育科技企业提供技术与人才支持,使实验室保持对社会需求的敏感度与创新响应力[38]。学生在参与项目过程中扮演研究者、产品设计者与评估反馈者等多重角色,有效打破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人才培养壁垒。在方法扩散层面,北海道大学实验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面向全国研究机构系统开展实验方法培训与暑期学校,既推动了前沿方法的本土化传播,又培育了能将实验范式与本土社会问题深度融合的青年学者群体,使实验室承担起方法扩散与区域学术网络节点的双重功能。

(五)数据共享平台与国际开放合作网络建设

在开放科学理念的推动下[39-40],社科实验室逐步演变为跨机构合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高校社科实验室的竞争力越来越体现为在全球知识网络中的开放程度与枢纽地位。同时,尽管大规模社会科学数据的可及性为学科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但数据共享基础设施建设、数据管理规范、统计方法革新及研究伦理政策等方面的系统性滞后正在制约这一潜力的释放,需要建立开放共享平台弥补制度缺口[41]。在此背景下,国外高校社科实验室均高度重视国际合作网络与开放数据平台建设,使社科实验室从孤立研究节点转变为网络枢纽,提升其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数据共享层面,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通过打造 Dataverse 数据平台,汇聚了来自哈佛及其他机构、团体和个人的多元数据,涵盖 2 000 余个数据空间、7.5 万余个数据集以及 35 万多个数据文件[42]。该平台的开放许可体系和元数据标准,事实上构成了全球社会科学数据共享的重要基础设施,使哈佛大学在数据规范和方法标准上拥有了重要话语权。在国际协作层面,日本北海道大学实验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通过建设国际网络实验平台,与牛津大学、德国马普所等顶尖机构开展跨国同步实验,使多国受试者能在统一时间参与同一实验任务,为分析文化差异与制度差异对行为结果的影响提供了新工具。在网络构建层面,智利社会冲突与凝聚力研究中心(COES)通过与智利各地学术机构建立持续的合作网络,整合智利各区域学术资源,并结合战略联盟、联合研究与国际会议等机制,强化不同地区与国际学界之间的学术联结。同时依托“智利纵向社会研究(ELSOC)”这一面向全球开放的高质量率样本数据库,推动数据共享机制建设。

四、我国高校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的典型实践

自 2021 年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启动以来,我国高校社科实验室整体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在空间格局上,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形成了多省份联动、分层推进的战略布局。在学科结构上,整体呈现“经管主导、文理融合”的态势,约 60% 的实验室名称涵盖“数据”“智能”“计算”等关键词,体现出鲜明的数字化转型导向。在组织形态上,高校独立建设、跨机构协同及政产学研联动模式并行发展,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治理的能力持续增强。本文以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化传承与两岸融合发展数智实验室 3 所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为典型案例,总结我国高校社科实验室在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先进经验。

(一)战略使命牵引下的发展定位

我国高水平高校社科实验室建设核心锚点更倾向于国家战略需求与区域发展议题,实验室目标定位与国家战略需求的深度耦合。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明确将“国家战略驱动”列为首要建设原则,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核心命题,围绕数字治理、数字政府等关键领域构建研究体系。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将目标设定为“理论创新高地”和“国家重大经济政策模拟和评估中心”,致力于通过微观行为研究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模拟与评估支撑。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化传承与两岸融合发展数智实验室聚焦两岸融合发展,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使命,多年来以政策报告、舆情监测等形式为各级党政部门提供战略咨询,服务国家对台工作。

(二)跨学科协同的组织模式与运行机制

在组织运行层面,我国高校社科实验室逐步突破传统院系的科层约束,积极探索适应交叉研究的治理架构,并在内部采用主题实验室或子实验室的矩阵式组织结构,从而在保持学术独立性的同时确保组织运行的规范性与高效性。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下设 6 个主题实验室,各主题实验室在开放参与和共建共享原则下自主推进研究。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设

立管理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前者负责重大事项决策,后者担任最高学术指导机构,内部按研究领域划分为实验与行为经济学、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等6个方向。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化传承与两岸融合发展数智实验室管理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方向审议,两者双重治理,分工明确。下设两岸语言文学、两岸社会心态与舆情研判、两岸人地关系、两岸教育融合与治理4所子实验室,有效整合多学科力量。

(三)自主创新导向的平台与工具体系建设

数据平台与分析工具的建设是社科实验室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我国高水平高校社科实验室在这一领域呈现出鲜明的自主创新导向,强调基于中国情境的原创性数据库开发与专业化分析工具研制。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依托大数据构建基础条件平台,为全校社科研究提供跨学科研究的基础数据与关键基础设施,并建设了面向国家治理重大场景的治理仿真平台,运用数字化技术开展政策推演仿真与社会实验。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自主研发了经济学实验系统、世界经济学实验系统、碳市场交易机制虚拟仿真实验管理系统、博弈论与经济学实验软件等专业软件,并获得多项国家软件著作权;同时建设了城市与区域经济空间发展数据库、地方政府财政经济指标数据库、中国全样本民营企业OFDI数据库等多个自主研发数据库。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化传承与两岸融合发展数智实验室搭载了全国首个两岸文化融合发展领域的垂直大模型,自主开发了涵盖两岸环境演变、人口迁徙等8类13个数据库,建成“台湾历史与文化数字博物馆”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成果。

(四)科研育人融合的人才培育模式

在人才培育方面,我国高水平高校社科实验室以多元化培养路径提升青年学者的跨学科研究能力,注重学生的方法掌握与实践参与。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推出的“清华交叉学科研究能力提升计划”包括大数据与因果推断研讨班、Stata应用研讨班等精品项目,不仅面向校内学生,还吸引国内外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学者参与学习交流,帮助学生掌握因果推断方法,提高实证研究能力。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依托国家级经济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立了数据分析层、基础理论层和专业分析层3个层次的实验教学课程体系,探索“经典理论课程加实验项目”“科研成果转化实验项目”“实验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等实验课程建设模式,同时实验室教师指导学生在国内高水平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实现了科研与育人的深度融合。

(五)开放协同的科研生态

我国高水平高校社科实验室正构建起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科研生态系统,通过制度化的开放课题设置、跨机构联合研究、国际学术交流等方式,知识生产过程的外部嵌入性不断增强。以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为例,其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建立了明确的开放课题管理制度,面向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大学、研究所等单位设立开放课题,资助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的科技工作者依托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并制定了详细的申请审批程序、课题管理办法、经费使用规范及成果管理评价标准,吸引校外研究力量参与,形成跨机构的科研协同网络。

五、我国高校社会科学实验室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高校社科实验室已在功能定位、组织模式、平台建设、育人路径和科研生态等方面形成了初步但可辨识的经验模式。然而,上述进展尚属少数高水平高校社科实验室的局部探索,从整体来看,我国高校社科实验室建设仍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影响和制约着我国高校社科实验室的发展。

(一)战略定位趋同,分类分层建设格局尚未成型

尽管我国社科实验室数量规模持续扩大,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实验室在功能定位上

呈现同质化倾向。一些“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地方高校、综合性大学与专业特色院校在实验室建设方向与定位逻辑上缺乏实质性差异，容易忽视自身学科禀赋与区域比较优势，造成有限资源的分散投入与发展重心的模糊化。部分实验室对文科实验室的内涵理解差异较大，对实验室在未来学科转型发展中应发挥的核心作用认识不足，这种前瞻性思考的缺失直接削弱了实验室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以公共政策学科为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相继设立相关实验室，更多高校亦在陆续跟进，该领域实验室数量持续攀升[43]，但差异化发展路径尚不清晰。与此同时，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统一的分类建设标准，区域发展不均衡。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五省份集聚了 70% 以上的国家级实验室，依托顶尖高校资源已经形成显著的集群效应，而中西部地区高校无论在社科实验室规模还是特色实验室建设方面，仍面临较大发展压力。

（二）治理机制滞后，跨学科协作的制度性障碍尚未突破

管理体制僵化是制约我国社科实验室深化发展的核心困境。多数实验室虽以“新型科研平台”为定位，在实际运营中却仍套用传统文科院系的科层化管理模式，层级分明、审批繁琐，与跨学科研究所要求的灵活协作和动态整合形成深层制度张力。研究生培养体系、导师聘任机制及科研成果认定多由原院系主导实施，致使实验平台在招生组织、学位管理与质量控制等关键事务上的决策空间有限，难以形成真正“平台主导、院系协同”的治理格局。跨学科教师参与实验室工作的合法性与激励机制尚不健全，双聘教师在职称晋升与绩效认定方面面临权责模糊的困境。部分实验室虽然尝试建立“双聘”机制，但归属不明、人事考核与绩效分账缺位等问题普遍存在，使得跨学科团队的稳定性难以保障。针对田野调查、社会实验等时效性较强的科研活动，现行财务与人事制度亦缺乏相应的弹性支撑机制，严重压缩了社科实验室的创新空间。

（三）经费结构失衡，多元可持续投入机制仍待建立

经费来源高度集中是制约我国社科实验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当前绝大多数实验室的运营经费主要依赖财政拨款与纵向科研项目，市场化、社会化融资渠道极为有限。这种单一化经费结构导致实验室在项目周期结束后面临运营中断风险，长周期的社会追踪调查与数据基础设施维护缺乏稳定的制度性经费保障。对竞争性项目的过度依赖，也使实验室研究方向容易随短期政策风向漂移。设备资产管理问题同样突出，对某重点高校调研发现，社科实验室部分高精尖计算设备因缺乏专业运维人员而长期闲置，而基础性数据采集工具与调查平台却因经费不足无法及时更新，形成“高端设备空转”与“基础设施欠账”并存的结构性失衡，严重影响了整体科研效能的释放。此外，经费使用方面存在“重硬件轻软件”倾向，持续性的数据维护、算法升级等软性投入缺乏保障机制。

（四）育人机制不健全，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亟待完善

社科实验室在人才培养功能上的发挥尚处于初级阶段，复合型研究人才的供给严重滞后于新型研究范式的实践需求。目前学生参与实验室项目主要停留于兼职助研层面，缺乏系统性的“做中学”培养路径与制度化的学分认定机制，项目制育人模式尚未真正落地。跨学科课程设置与学制弹性缺乏刚性政策支持，评价指标仍聚焦单一学科成果，导致实验室难以形成“平台主导、院系协同”的育人格局。实验室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普遍滞后，从事数据管理、计算建模与技术研发的专职人员岗位设置明显不足，现有团队结构呈现“重理论研究、轻技术运维”的失衡态势。此外，本硕博梯队衔接机制尚不完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系统培育缺乏制度化路径，国际化联合培养渠道仍待拓展。

（五）国际合作渠道不畅，学术话语构建能力亟待增强

与国际一流社科实验室相比，我国高校社科

实验室在全球知识生产网络中的嵌入程度明显偏低，国际合作呈现“广度有余、深度不足”的总体特征。现有合作形式多停留于参加学术会议、开展短期学者互访等浅层交流，在联合共建数据平台、主导国际研究议题设置以及参与全球开放科学治理等深层次合作领域，实质性进展十分有限。近年来，科研合作日益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交织，尤其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研究者必须在国家政治议程、组织绩效指标与全球学术规范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制度复杂性使得跨境合作的条件受到诸多约束，研究者需要运用复杂的策略来维系国际合作网络。在学术标准与工具开发层面，我国社科实验室在数据格式规范、研究伦理框架及统计分析工具等方面尚未形成具有国际通约性的标准体系，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参与度整体偏低。数据共享机制建设相对滞后，跨机构数据共享的制度性障碍尚未突破，基础数据库不完善等问题制约着实验室参与全球数据合作的能力。

六、我国高校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的主要策略

推动我国高校社科实验室高质量建设，须坚持国家战略需求导向，将对标国际前沿与立足中国国情相统一、服务国家战略与遵循学科规律相统筹、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相协同，紧紧围绕功能定位、治理机制、资源保障、人才培养与开放合作5个关键维度，着力破解制约社科实验室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难题，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体系，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平台支撑与制度保障。

（一）明确差异化发展定位，优化实验室功能结构

高质量社科实验室体系的核心逻辑在于分层分类、精准定位，不同类型高校承担差异化的功能角色，而非追求同质化建设模式[44]。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现实特征，应积极引导各类高校依据自身学科优势与办学定位确立社科实验室的建设方向。具体而言，“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对标国际一流科研机构，依托雄厚的科研基础与跨学科资源，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在关键理论创新、方法工具开发以及国际学术规则塑造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原创性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持续产出。地方高水平大学则应更加突出区域服务导向，重点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议题开展数据整合、方法支持与政策评估，发挥连接国家战略与地方治理实践的重要枢纽功能。相比之下，应用型本科院校及高职院校不宜简单复制研究型大学的大型实验室模式，而应采取更加灵活的嵌入式发展路径，依托既有学科基础建设小型化、模块化的社科实验室，或与区域性科研联盟开展协同研究，重点承担数据采集、社会调查实施及基础数据处理等任务，从而嵌入更为广泛的科研网络体系之中。高校还可结合学科特点细化功能定位。综合性大学宜重点建设“赋能型平台”实验室，依托多学科交叉优势与较为完备的科研资源体系，参考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模式，整合多源数据资源、构建开放共享的计算基础设施，辐射带动区域社会科学研究数字化、智能化转型[45]。理工科优势高校可探索“交叉创新特区”实验室，参考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建设经验，聚焦前沿科技与人文社科的深度交叉，促进技术创新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学科特色鲜明的高校则可深耕优势学科领域，打造“引领型高地”实验室，通过方法革新与专项数据库建设持续强化学科竞争优势，逐步提升我国相关领域在国际学术版图中的影响力。

（二）推进制度创新，构建适应交叉研究的治理机制

传统院系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多数社科实验室跨学科深度协作与组织模式创新。突破传统治理模式刚性束缚、构建兼具灵活性与制度保障的新型治理体系，是释放创新活力的关键[3]。第一，在人才管理方面，改革现行实验人员评价体系[46]，赋予实验室更大的自主权。建立独立于传统院系体系的实验室岗位序列，为数据管理、平台运维与技术研发等专业岗位提供清晰稳

定的职业发展通道;推广跨院系“双聘制”,允许骨干人员跨单位兼职,并将“跨学科协作贡献”与“平台建设实绩”纳入职称晋升的评价权重体系[47]。第二,赋予实验室充分的经费统筹权。优化财务管理柔性,允许实验室负责人在预算框架内动态调整设备采购与人员激励的经费结构[48];探索跨年度预算滚动支持机制,尤其针对长周期社会追踪调查与大规模数据运维项目提供持续稳定的经费保障。第三,推行扁平化组织模式。建立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决策委员会,精简冗余行政层级;设立社科实验伦理专项委员会,建立标准化的数据分级访问与伦理审查流程,确保技术驱动的研究实践始终嵌于人文公共价值的约束框架之内。

(三)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提升科研韧性与学术自主性

构建高校基础保障、竞争性项目、社会合作相结合的多元投入机制,是提升社科实验室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49]。一是高校应将实验室基础运行经费纳入常态化预算,重点保障数据平台建设、软硬件设施维护以及技术团队运转等基础性支出,以确保实验室公共服务功能稳定运行。二是鼓励社科实验室围绕国家重大需求积极争取竞争性科研项目,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渠道获取研究经费,并将项目资源转化为平台能力建设的重要支撑。三是在坚持学术独立与科研伦理的前提下拓展社会合作渠道,与政府部门及企业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联合研究平台、政策实验或数据库共建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源。四是设立校内“概念验证”和种子基金[50]。针对高风险、高不确定性但具有潜在突破性的研究设立小额、灵活的种子基金,支持青年学者和跨学科团队先行开展前期探索,激发原始创新动力。

(四)发挥实验室育人功能,培育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社科实验室不仅是知识生产的重要平台,也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51]。要充分发挥社科实验室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独特优势,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第一,深化项目制与课程体系的融合导向。参考海外高水平实验室“项目育人”模式,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于具体项目实践中提高学生综合能力。设立“实验室学分”机制,围绕“计算社会科学”等前沿课程,将学生参与实验设计、软件算法开发、政策报告撰写等实质性产出纳入考核范畴,允许其折抵学分或部分替代毕业论文。第二,构建本硕博贯通的梯队式培养模式[52],建立以博士生为理论引领、硕士生为实操中坚、本科生为辅助的阶梯式组织。第三,探索多导师协同指导机制,在学术导师之外引入技术导师与实践导师,为学生提供方法、技术与实践经验等多方面支持,从而提升学生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综合能力。第四,建设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学习社区。依托社科实验室的数据平台和在线协作工具,构建跨校、跨区域的在线学习与研究共同体,定期开展工作坊、暑期学校等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学者和学生参与到实验室的研究与工具开发中,形成开放式人才培养生态[53]。

(五)拓展国际合作网络,提升学术话语主导权

在全球知识生产高度网络化的背景下,我国社科实验室应主动融入和重塑国际合作网络[54]。第一,研发具有“中国范式”的社会科学分析工具链。聚焦共同富裕、数字乡村、大国治理等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重大议题,研发自有数据结构和逻辑解释的模型工具,并通过开源化路径降低全球学术界的准入门槛,提升中国学术标准的国际普适性。第二,深度参与及引领国际开放科学议程。积极对接国际顶尖学术共同体,在元数据标准、数据跨境治理规范等领域贡献“中国方案”,提升数据主权下的国际协作水平。第三,抢占新兴交叉领域的学术规则制高点。依靠社科实验室在前沿技术社会影响领域的观测优势,主动发布人工智能伦理指南、算法治理白皮书。通过“国际联合实验室 + 青年学者双向访学”模式,以高频次、深层次的智力流动提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全球学术版图中的影响力。第四,建设中国特色的开放数

据平台。建设面向全球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数据平台,汇聚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高质量研究数据,提供数据存储、管理、发现、引用、分析等一站式服务。

参考文献:

[1]顾锋. 中国文科实验室创新发展路径研究[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3(6):1-14.

[2]熊婉婷,崔晓敏. 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教训与挑战: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J]. 国际经济评论,2019(2):57-74,5.

[3]李沅傧. 组织范式变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的探索与思考[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24,41(3):285-292.

[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5(4):3-10.

[5]唐斌,朱德宸,于慧敏. 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新文科转向":轨迹、视野与进路[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25,42(1):265-272.

[6]吴超. 数字时代下的文科实验室建设[J]. 天府新论,2025(6):20-29,151.

[7]王震宇,薛妍燕,邓理. 跨越边界的思考:新文科视角下的社会科学实验室探索[J]. 中国高教研究,2020(12):61-68.

[8]刘大椿,潘睿. 人文社会科学的分化与整合[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23(1):141-150.

[9]COPPOCK A, GREEN D P. Assessing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xperimental results obtained in the lab and field: a review of recen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J].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2015, 3(1): 113-131.

[10]顾洁,刘炜.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型[J]. 社会科学,2025(6):165-176.

[11]IDC. 全球市场洞察丨IDC DataSphere 最新趋势预测[EB/OL]. (2024-10-18)[2025-11-28]. https://my.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52667624.

[12]臧雷振,王路阳. 大数据与小故事:社会科学研究中数据人文主义的实现路径[J]. 社会科学,2025(5):5-15.

[13]MARGINSON S. What drives global science? the four competing narratives[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2022,47(8):1566-1584.

[14]KING G. Restructuring the social sciences: reflections from harvard's instituteforquantitative social science[J].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2014,47(1):165-172.

[15]王洋洋,张媛.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建设对国内高校的启示[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25,44(1):223-227.

[16]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1).

[17]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5(25):16-20.

[18]BRINGMANN W G, UNGERER G A.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stitute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t leipzig university[J]. Psychological research,1980,42(1):5-18.

[19]李石勇. 加强新型文科实验室布局 助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EB/OL]. (2025-07-29)[2025-11-29]. https://www.cssn.cn/jyx/jyx_ttxw/202507/t20250729_5907450.shtml.

[20]MORRIS A. The sociology of WEB Du Bois as a weapon of racial equality: pioneering scientific social research at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J]. Quaderni di sociologia,2020,64(83-LXIV): 11-24.

[21]WRIGHT II E. W. E. B. Du Bois and the Atlanta sociological laboratory[EB/OL]. (2016-02-03)[2025-08-21]. https://berkeleyjournal.org/2016/02/03/w-e-b-du-bois-and-the-atlanta-sociological-laboratory/.

[22]ASSO P F, FIORITO L. Human nature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stinct psychology, behavior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institutionalism[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2004,26(4):445-477.

[23]COURSEY D. Vernon smith, economic experiments, and the visible hand-econlib[EB/OL]. (2002-10-28)[2025-08-22]. https://www.econlib.org/library/Columns/CourseyVSmith.html.

[24]彭建波. 北美人文社会科学数据管理的实践及其启示[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31(6):33-37,87.

[25]鲁世林,李侠. 国外顶尖国家实验室建设的主要特点、核心经验与顶层设计[J]. 科学管理研究,2023,41(1):165-172.

[26]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The belmont report[EB/OL]. (1979-04-18)[2025-11-29]. https://www.hhs.gov/ohrp/regulations-and-policy/belmont-report/read-the-belmont-report/index.html.

[27]罗玲玲,李良敏.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新机制探析[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8(6):1184-1188.

[28]李泉. 数字人文:开创人文研究的新纪元[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156-165.
[29]蒙曼,李中远,姜政汉,等. 数字化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J]. 世界社会科学,2023(6):31-67.
[30]罗俊. 计算·模拟·实验:计算社会科学的三大研究方法[J]. 学术论坛,2020,43(1):35-49.
[31]加里·金,黄建军,杨文辉. 重构社会科学:基于哈佛定量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反思[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5):125-135.
[32] GOTTESMAN D B. Data science services at IQSS: harnessing data interpretation for academic advancement[EB/OL]. (2023-11-20)[2025-08-20]. https://www.iq.harvard.edu/news/data-science-services-iqss-harnessing-data-interpretation-academic-advancement.
[33]袁广林.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跨学科研究的经验与启示[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8):81-85.
[34]RAMSEY C B. Radiocarbon calibration and analysis of stratigraphy: the OxCal program[J]. Radiocarbon, 1995, 37(2):425-430.
[35]王佃利,展振华. 范式之争:新公共管理理论再思考[J]. 行政论坛,2016,23(5):38-42.
[36]常凤霞,张志宇. 北海道大学社会科学实验研究中心的运行及其启示[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22,41(11):157-164.
[37]HASSAN R. The MIT media lab: techno dream factory or alienation as a way of life? [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03, 25(1):87-106.
[38] LUCKIN R. What inspired my thinking to create UCL EDUCATE? [J]. Research for All,2021,5(1):16-18.
[39]THIBAULT R T, AMARAL O B, ARGOLO F, et al. Open science 2.0: towards atrulycollaborative research ecosystem [J]. PLoS biology, 2023,21(10):e3002362.
[40] BARTLING S, FRIESIKE S. Opening science: the evolving guide on how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scholarly publishing[M]. Berlin: Springer Nature,2014:17-47.
[41] KING G. Ensuring the data-rich future of the social sciences[J]. Science, 2011,331(6018):719-721.
[42] CIABURRO G, IANNACE G. Machine learning-based algorithms to knowledge extraction from time series data: a review[J]. Data, 2021, 6(6):55.
[43]陈先才,胡雪儿. 整合重构:新文科背景下的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路径探析[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185-192.
[44] CAI Y. From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novation process in higher education to an emerging research field of innov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J].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2017,40(4):585-616.
[45]庞珣. 人工智能赋能社会科学研究探析:生成式行动者、复杂因果分析与人机科研协同[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7):3-30,153.
[46]宋姗姗,唐曼,黄璜. 基于 WSR 的文科实验室建设框架、评估体系与发展愿景[J/OL]. 高教发展与评估,1-13[2026-03-10]. https://link.cnki.net/urlid/42.1731.g4.20260125.1346.008.
[47]相博文,储祖旺. 跨学科背景下我国高校教师校内双聘制的现实审视与优化策略[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25(4):89-102.
[48]陈平泽,刘星月,孙天齐. 高校分类改革视域下科研经费结构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2025(7):41-47.
[49]农春仕,孟国忠.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运行机制的探究[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20,39(4):249-252,284.
[50]罗文恩,黄英. 官民商协作与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来自中国香港的经验及启示[J]. 公共行政评论,2018,11(4):97-118,180-181.
[51]钟伟春.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的世界经验与中国路径[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25,44(11):215-221.
[52]张炜,王战军,陈鹏,等.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解读笔谈[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5(4):1-19.
[53]林原,许晨曦,许侃,等. 基于扎根理论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24,43(12):186-194.
[54]胡菲菲,张思思.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文科实验室建设特点与趋向[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23,40(1):221-226.